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八七期 ——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3c)

| | | |
|--------|--------------------------|-----|
| 【史海钩沉】 | 周恩来“文革”初何以要对北京公安局班子“一锅端” | 王 锐 |
| 【亡灵祭坛】 | “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的一生 | 彭洁清 |
| 【恐怖岁月】 | 方忠谋被儿子出卖而死 | 汪海涛 |
| 【劫后反思】 | 我“斗”了我爸爸 | 傅靖生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周恩来“文革”初何以要对北京公安局班子“一锅端”

• 王 锐 •

◇ 北京市公安局成为“文革重灾区”

众所周知，“文革”中，公安部门是“重灾区”。其中又以北京市公安局为最。而1966年“文革”中，又以1966年至1967年的“文革”早期最烈。

资料显示，仅1967年12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提交给公安部，题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份材料中，就涉及北京市公安局全部正副局长10人（包括已调陕西任省委书记的前局长冯基平），正副处长，分局及县局正副局长117人，被诬为“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另有科及科以下1000余干警受牵连。材料称，北京市公安局，“全局有1000多坏人”。决定彻底砸烂北京市公安局，全面改组（见《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第334页，群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探究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京师地位重要。北京是首都，地位在全国举足轻重，治安

好坏，关乎首都安全和国家形象。

其二，公安局性质特殊，掌握有相当实力的半武装警力（包括公安部队即现今武装警察部队的调动使用权），以及技侦、刑侦等特殊手段。极端情况下，甚至可对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家人使用这些手段。比如1967年初，对付主要由高干子女组成的“联动”（其中不乏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以及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跟踪包括叶帅在内的军方高层的小车，并拍照，记车牌号上报追查等。

至于当年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对某些党政军高层人物本人，动没动用过监听、窃听等技侦手段，笔者有确切资料，不敢妄议。不过，倒是见到不少当年高层人物，比如叶帅、徐帅，以及一批军方高层将领怕窃听、防窃听的回忆和记叙。有文章记载，叶帅哪怕在部队戒备森严的西山住地，有段时间，每有访客上门谈话，他必将收音机音量开大，制造噪音和干扰，才肯正式谈话，以防窃听。

甚至邓小平这样的人，也怕窃听和防窃听。其女儿毛毛的书中披露，1976年4月，邓被第二次打倒。其后，软禁家中。每要与家人言及时局等敏感话题，总是来到卫生间，关上门，将浴缸水龙头开到最大，在哗哗水流声中谈事以防窃听。连当年10月，小儿子在外面听到拘押“四人帮”消息后，回家来告他。邓亦是引至卫生间，打开浴缸水龙头后才敢听。邓，叶都长居中共高层，对各种内幕知之甚深。如此小心防范，恐怕不是没有原由的。

正由此，每当时局生变或将面临大变，北京市公安局这个机构及其领导班子，就特别敏感，或成“兵家必争之地”。“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成“重灾区”，几任班子为此大吃苦头，结局都不太好，其深层原因也在这里。

不过，对于“文革”时北京市公安局成为“重灾区”的原因，大陆官方（甚至包括非官方）的文献记载和叙述，大都比较笼统地归于林彪、“四人帮”，少数将之归于毛泽东。基本上没提到周恩来在其中起的主导作用和责任。这显然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近年，笔者研究“首都工作组”这一课题，其中，就涉及当年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的事实。而当时采取这一“非常措施”，其决策者及实际指挥者，正是周恩来。

◇ 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才是“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

“文革”运动初期，向首都高校、各中学，和一些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一事，成了毛泽东要整倒刘少奇，安于其头上最主要的一个“罪名”。

而几乎所有的“文革史”和相关文献都认为，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后，当天晚上，北京新市委向北大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取代北大党委领导，是“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

后来，有些著述又认为，此前一天，陈伯达率领的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才是真正的“文革第一工作组”。而这个工作组，是5月30日，在北京的刘、周、邓联名向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请示过，经毛泽东同意的了。

不过，笔者在研讨“首都工作组”及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课题时，竟然发现，当年经高层指令，由公安部派往北京市公安局夺权的“李钊工作组”，其派出的时间比派往《人民日报》的“陈伯达工作组”要早半个多月。因此，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革第一工作组”。

相关文献有如此记载：

1966年5月12日，公安部的谢富治派出了以李钊为首的44人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到6月20日，谢富治先后六次派人数达313人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28页）。

这个工作组由公安部人员组成，以李钊为组长。其时，李钊是公安部的一位局长。而谢富治是公安部部长，因此，这里说是谢富治派出。不过，事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其真相和内幕，应有相当深度。

首先，中共一直实行的是“党指挥枪”原则。对公安警力，也是这种组织控制模式。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班子组成和权力转换，是由北京市委做主。公安部对北京市公安局，只有工作和业务指导权，无人事任免权，更无彻底改组权。直到现今，仍是这种模式。此其一。

其次，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党内高层的排名中，位列第八。而谢富治，在中央的地位和实权，远在彭真之后，起码差几十位。如果没有中央高层的授权和指令，谢富治再有十个胆子，也不敢派工作组到北京市公安局夺权。

再次，当时北京治安等方面，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或北京市公安局班子，在其他工作中有什么严重过失，需要公安部派工作组进驻，接管其领导权。

因此可见，这次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是党内斗争的需要。具体点说，是相当高层的一次政治布局。李钊工作组也好，谢富治也好，不过是充当了一枚棋子。这些举措，主要针对的是彭真及其手下亲信。

彭真的失势倒霉，是从1966年初开始的。

由于他没真正领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对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内幕详情一无所知，一开始就对姚文元这篇文章，采取抵制态度。《人民日报》及北京市委控制的《北京日报》，没有转发姚文元文章。直到周恩来出面打招呼，《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首都报纸，才在11月30日转发了该文而且比《解放军报》迟了一天。事情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极为不满。

接下来，所谓《二月提纲》事情，在毛泽东那里更是火上浇油。1966年2月，彭真主持的“中央五人小组”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2月12日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后被毛泽东批为是“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其实中共中央发出之前，彭真等专去武汉向毛泽东详细汇报过毛当时并未表示不同意见）。

3月11日，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毛泽东大为震怒的事。《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因是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并向毛泽东汇报过的，上海张春桥等摸不[气候，派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杨在京找到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

11日，许向彭真汇报同杨的谈话。其中提到，杨问许立群，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对上海发姚文心里有气，就对此回答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

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没料，正是此话大大触怒了毛泽东。

彭的这些回答，当即由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杨回上海后向市委汇报。张春桥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这一“电话事件”，通过江青报给了毛泽东。毛震怒之余，决心搞掉彭真。

3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两次找康生等人谈话，痛批彭真。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是包庇坏人。甚至称，“北京市委要解散”。毛泽东发话后，形势急转直下。

按毛泽东指示，4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杭州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解决彭真问题。这次会议，破例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毛压力下，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真所谓“反党罪行”。

4月22日，毛泽东作重要讲话。毛正式宣称：“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还说：“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面是很广的。”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明确表态，所谓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朝中有人”。这是要将斗争锋芒指向中央高层的信号。当时看，指的似乎是彭真。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实际暗指的是刘少奇。

这次杭州会议，彭真与会在场。会完返京后，即被停职并遭软禁。

5月4日开始，按毛泽东指示，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整个会议情况，由康生向杭州的毛泽东汇报并传达其指示。当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称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安部向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了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党委的权。

两天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共北京市委派出了工作组，说是“协助”北京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接管了北京市委，夺了市委的权。

◇ 北京市公安局8名正副局长先后被捕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是邢相生。邢相生之下，有副局长吕展、闵步瀛、阎塘、张烈、李一平、张锋、焦昆等。邢相生此前任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是1960年代初，接替已担任副市长的冯基平任局长的。吕展这时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还担任北京市公安总队（即现北京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兼政委。

公安部工作组进驻之初，原局领导班子成员，虽说大感意外，但还平静接受。这些人，都是颇有经历，也受过中共党内历次政治运动磨炼的资深干部。这次也准备象以往那样，所谓在运动中经风雨，“接受组织审查考验”。特别是多数人认为自身各方面无大问题，不怕审查，充其量坐一段时间“冷板凳”而已。

然而，这回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工作组不仅夺了他们的手中大权，而且正准备将他们置

之死地。整个北京市，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5月14日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后，原北京市委近于瘫痪。市委、市政府各高官、各部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中央没对外宣布改组北京旧市委，建立新市委之前，一切仍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在运作，在进行。

5月23日，北京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扩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决定。同时宣布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宣布对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部长（即现今政法委书记）刘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贾星五等5人停职检查。此前被停职检查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已于5月18日自杀身亡。

在这种严酷背景之下，因地位特殊，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很快遭到了灭顶之灾。

吴德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次中央高层对北京市委大改组时，不知什么原因被选中，紧急从吉林召至首都，出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在“文革”后，出版有口述回忆录一册，其中，谈及这段经历：

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工作的决定。我当时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

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时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到宋任穷时，提出能去不去北京？

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

我又问：北京的情况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吴德口述 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吴德还说：“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吴德说：“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李雪峰与我谈。”

尽管如此，吴德还是很快进入了角色。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采取“一锅端”的极端措施，吴德就是主要执行者之一。当然，他不是这一非常事件的决策者。

6月5日，在首都体育馆，以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名义召开了全市公安干警大会，有五千多人参加。吴德代表新北京市委，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出席大会。吴德在大会上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宣布新组建李钊为局长的市公安局5人领导班子。相关文章记载说：

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见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中国历史》2009年4月23日）

按吴德的回忆，当时他在会上宣布的所谓“隔离审查”，“停职检查”等表述，其实是文雅说法，真实事实其实就是逮捕。吴德说，当时，“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

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5页）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坐在台上主持大会的工作组组长李钊，本来是打算取代邢相生，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然而后来，这位新局长李钊也被捕了。吴德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长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逮捕了。”吴德还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

不过，这里吴德的记述应是有误。公安部派去北京市公安局先做工作组组长，后来又当了局长的那位李钊，以后确实又被逮捕了。但那是差不多一年以后的事。据原21军政委，“文革”初奉调公安部任副部长级政治部主任，后来兼任部党组成员的施义之回忆，李钊是1967年4月以后，因牵涉原东北公安局“李平生专案一事”，惹江青发火后，由谢富治授意逮捕的。施义之回忆说：

1967年4月，谢富治在部党组会上要我找几个人成立个专案组，从总参接收一个叫李平生的案子。

谢富治交代我们，不要问他什么，过些日子看他一次，他说什么就记录什么。李平生讲的内容大概有汪金祥同高岗的关系、同苏联顾问的关系，有关毛主席从苏联回来途经沈阳的消息通过逆用电台报台湾的事，还说到江青有病要烤电，等等。除h及汪金祥，还h及公安部的李钊（局长）……

李平生讲的问题越来越多，我觉得不可信，对他的品质发生了怀疑。两次派干部去辽宁，吉林了解李平生的情况，走访了40多人，都说李平生在诬告人，许多问题是无中生有。我认为李平生在诬告人，征得李震同意后，写了报告建议拘留李平生以弄清问题。

对于我的报告，李震向我传达谢富治的话，“江青看了报告又发火了，说怎么把揭发问题的人拘留，不管揭发的准不准，从中找线索嘛”。从这批评看，是要利用这些人的无中生有，达到打倒一批老干部的目的。我对搞专案有了疑问。

过了不久，谢富治要我和李震去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到那里看到谢富治、吴法宪和空军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谢要我立即把李平生案子移交给空政保卫部。同时，谢富治要我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李钊抓起来，我回部后安排e人去执行了。我明白，上面对我处理李平生专案极不满意。（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

可见，李钊后来之被捕，是h及其他事，而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班子问题。而且时间在1967年4月以后，不是“文革”之初。

◇ 老局长冯基平陕西被拘押

其实，当时被关押，以至最后被捕下狱的，不止现任局领导班子成员。还有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已升任北京市副市长，1964年调陕西省任省委常务书记的冯基平，以及长期分管政法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

在《冯基平传》中，详细叙了冯被捕经过。此时，冯基平正在北京治病养病。

1966年5月28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的秘书从西安打来电话说：“霍书记找冯书记说话。”冯基平赶忙来接电话。霍士廉在电话上说：“老冯，病治疗得怎么样了？澜涛的意

见，北京乱哄哄的，是不是请你回来，到临潼去疗养，那里清静些，你看怎么样？省委是不是派人来接你？”

.....

冯基平带着秘书5月31日从北京上了火车，6月1日到达西安。6月5日晚上9点多，陕西省委行政科长白泉来到11号院冯的住处，对冯基平说：“霍书记请您去一趟。”冯基平跟白泉走了，来到霍士廉的办公室。这时，西北局书记王林和霍士廉向冯基平宣布：“从今天起，中央决定你停止工作，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冯基平一言未发就退出来。接着，省公安厅副厅长鲁夫来了，从秘书手中把冯基平的手枪收去，后又查看了室内的电线，最后对冯基平的秘书们说：“这儿，由我负责，不要你们管啦，冯基平的秘书工作，由西北局派人。”（见《冯基平传》第327至329页）

冯基平被“隔离反省”后，由省公安厅负责关押监管，被当做“敌我性质”对待。一个长期担任京都公安局长的省委常委书记，竟然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受到如此对待，实在让人感叹。其实就连陕西省最高层人物，也不知他到底犯何事。

当时，同为陕西省委书记的章泽，曾悄悄问冯基平的秘书：“老冯是什么问题？”秘书也一脸茫然，回答说：“不知道。”再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被红卫兵批斗时，红卫兵问他：“冯基平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叛徒问题？”霍士廉也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

8月，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根据公安部专案组意图，弄出一份《北京市公安局已成为反党集团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阴谋政变的工具》的材料上报。正式将北京市公安局原班子，定性为“阴谋政变工具”。由此株连的人，数百上千。正式逮捕者，也数以百计。北京市公安局，正如吴德所说，被“一锅端”了。

冯基平后来被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

讽刺的是，这秦城监狱，正是冯基平当时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时，亲自主持建造的。整个监狱布局和牢房建筑，都是他找人设计的。许多狱中措施和规定，都是他拍的板。比如说，所设置的封闭性单间（隔离间），无窗无灯，一片黑暗，墙的四壁都镶贴了弹性橡胶皮，头撞上去会弹回来，使你无法自杀。建造秦城监狱时，这位大权在握的京都公安机关首脑，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本人也会被以囚犯身份关到这秦城来，而且“享受”这“单间”待遇。现实的荒谬，何至如此！

冯入狱后，也亲尝了隔离间滋味。同时，因为他坚决不认罪，不肯按专案组意图交待问题，被称态度恶劣。事情报到了分管专案的康生那里。1967年12月1日，康生提出，要给冯基平加铐子。

到了1968年1月3日，康生在专案组上报的一份材料上写下如此批示：

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崔月犁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对一般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的工作。（转引自《冯基平传》第335页）

由此，冯基平等在狱中上了手铐。刘仁当是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长期分管政法。崔月犁是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徐子荣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当年罗瑞卿离开公安部时，曾向中央推荐徐接任公安部长，未获毛泽东同意，后调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长。徐子荣一直被视为罗瑞卿心腹、

“死党”，“文革”开始，徐也随罗遭殃，直到被迫害致死。

冯基平还上的是“背铐”。这种“背铐”非人待遇，他整整上了4年多。据称，最后，是毛泽东听汪东兴关于冯案案情，以及冯狱中不服管教监规的情况汇报。其中提到，冯基平不认罪，不服管教，因此戴了几年“背铐”的情况。毛听后，皱了眉，当场发话说：“把那玩意儿（指背铐）给他摘下来。”专案组及秦城狱方，这才解了冯的“背铐”。

冯妻汪璜，后来亦因冯基平牵连被捕，也关于秦城监狱。

关押甚至逮捕北京市公安局领导成员，以及与之相关的领导，应当说，这是非常时期下的“非常措施”。原因只有一个，是中央高层人物，对北京市公安局一帮人不放心。因为担心他们都可能都是“彭真的人”。

深层原因是，要保证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顺利向纵深发展；同时，更紧要的是，当时要保证毛泽东在北京的绝对安全，防止倒台的彭真发动“反革命政变”，就不惜采取这种过激的非常措施。

说到底，这就是“政治需要”。管你有罪没罪，无辜还是不无辜，先抓起来再说。政治的残酷性，玩政治者的冷血与无情，于此可见一斑。

◇ 周恩来及其所主持下的“首都工作组”

前文讲过，吴德说将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8人全部逮捕，一网打尽，其指令，是“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

这个“中央负责同志”，正是指的周恩来。而具体决策和执行依据，则是当时新建立起来其职权跨越党政军警各界，权力极大的一个称为“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当时“首都工作组”一切重大行动和举措，均要周恩来最后拍板。

关于对外界来说，显得很神秘、很不寻常的“首都工作组”，一度曾参与其事的吴德，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记叙：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工作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4至5页）。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具体经过和背景，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想法和最后决定，是由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作出，并遥控在北京的周恩来予以落实执行。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从成员名单来看，这个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就是说，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事。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而所谓“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内容就是，只对周恩来一个人负责。而周恩来，只对毛泽东负责。

从此举看，其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充分信任的。否则不会将关系着毛自身安全的如此权力，如此重责，放心交付于周。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体现或执行的正是毛泽东某些意图，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和指挥。

不管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其着眼点，最主要的，还是“防政变”。周恩来之所以坚决彻底地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恐怕原因正在这里。毕竟，彭真在北京市经营已久，威信和影响巨大。而北京市公安局掌握着相当警力（包括北京公安总队），以及一些特殊手段。现在搞掉彭真，怕出意外，所以干脆来个“一锅端”。

◇ 走向军管、刘传新结局及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被搞掉后，由公安部工作组代掌其权的局面大致维持了半年左右。随着“文革”局势的发展，尤其是，全国范围内，对运动初期“工作组”问题的否定批判不断升级，“工作组”，已成了“镇压群众”，“破坏文革运动”的代名词。在此大背景下，公安部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起来。

到1966年年底，在公安系统内部造反派，和首都政法系统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双重夹击下，北京市公安局这个由公安部工作组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不单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说话没人听不说，自身地位也岌岌可危。

1967年1月，在“一月风暴”影响下，北京市公安局也被“夺权”。关于这次夺权经过，带官方性质的正统著述，有如下记载：

阴谋家谢富治，依据形势的发展，认为公安部的“工作组”不能尽快砸烂公安局，于1967年1月17日，鼓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造反派的头头陈荣金、徐贵春与公安局“公安公社”造反派的头头王应凯，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33页）

这种叙述，显然与事实真相有较大出入。真实内幕是，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并接管北京市公安局，是经周恩来同意并亲自下的指示，得中央最高领导层批准才行动的。责任根本不在谢富治身上。

知晓内情的公安部前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施义之，对此记叙说：

公安部派局级干部李钊、刘坚夫、程诚等一批干部去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接管干部也成了批斗对象，他们都要求回原单位。中央决定从军队抽调干部去实行军管。正在这时，以政法学院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政法公社”要求接管公安局，周恩来总理同意让他们试试。“政法公社”接管公安局后镇压了四季青公社的一派群众组织，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打人、武斗等事件，他们无力处理。为此，公安部还专派一些局、处和一般干部协助他们处理。鉴于这种情况，周总理又给“政法公社”的群众做工作，说你们能力不行，公安局应该由军队接管，要“政法公社”撤出北京市公安局。（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

可见，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并夺权，既非造反派野心，更非林彪、“四人帮”甚至谢富治“阴谋”。而且，笔者认为，如此重大并且出格的事情，如果不是毛泽东发过话或点头首肯的话，起码也是周恩来摸准了毛泽东的心思，才指示让红卫兵接管首都公安机关的。有相关文献为证。

据《周恩来年谱》，此前一天的1月16日，周恩来当天的活动有如下记载：“参加中央碰头会。会上，毛泽东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13页）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原来打算实行军管的北京市公安局，突然改由学生接管夺权，其指令来自中央最高层。

不过，这种带有胡闹性质的，由政法学生接管首都公安局的尝试没持续多久。仅仅过了20多天，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就实行了军管，正式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最初的领导班子，中央作如下安排：军管会主任牟立善，军管会政委范普权，副主任：刘传新，王更印。这几人均是从各军区抽调的现役军以上干部。后来，牟立善、范普权因故未能到职。真正到任的是两位副主任，刘传新和王更印。

由于刘传新排名在前，又更善于揣摩及迎合上面的意图，刘传新大受高层赏识重用。这里所说的高层，既包括北京市委和公安部主要领导谢富治、吴德这些人，也包括周恩来，还有江青，甚至包括后来进入中央大权在握的王洪文、张春桥、华国锋等。由此刘传新统治北京市公安局差不多整整十年，开启了首都公安机关的“刘传新时代”。刘传新后来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局党委书记等，成京城权贵之一，风光无限。

刘传新原是南京军区某军的副政委，被称为“能文能武”，颇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赏识。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时，拟抽一千多军官进驻。南京军区名额中指定要军职干部一名任市局主要负责人之一。南京军区杜平政委、鲍先志副政委等几人找许世友汇报研讨时，许世友发话说：“叫刘传新去！”一锤定音。该军前身即华野X纵，该纵队是许世友的基本部队，

许世友熟悉刘传新。

中央当年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带有对全市各级机构和人员从上至下全面改组，彻底铲除彭真旧有影响和势力的意图，因此组建的军管阵容非常大。共抽调有各级军官1400余名，名单报上来，人员在北京集中后，由公安部进行政审。施义之就是当年负责审查接送这1000多军管干部的主要负责人。

施义之回忆说：“到公安部后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带政治部的十多位干部审查从大军区调来、准备到北京市公安局执行军管任务的1400余名军、师、团、营、连干部。”又说，“政法公社撤出，1400名军队干部开进北京市公安局。进驻前在北京饭店开了动员大会，有谢富治、李震、杨奇清、吴德等人参加。谢富治、吴德讲了话。”“其中军级干部任市局领导，师级干部到各区分局任领导，团、营干部为处、科领导，连级干部到各派出所。”

刘传新接任后，对高层要彻底清算改组首都公安机关的意图大概心领神会，而且跟得很紧，开始了一系列动作。3月24日，军管仅一个月左右，刘传新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弄出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不仅如此，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CC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

由此，刘传新为中央高层当年将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找到了依据和“罪证”。

正如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所批示的：“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的态度。对这些人他应该说是相当熟悉的，有些人他可谓了若指掌。可是，对这些明显的诬陷不实材料，他不提任何反对意见，而是批示照送毛泽东不误，坐等毛泽东发话。

倒是毛泽东自己，看出了其中的荒谬和不可信。1967年12月，毛泽东对刘传新上报的材料，提出了质疑：“10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

不过，尽管毛泽东发了话，一直到文革结束，冯基平、邢相生等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成员“罪名”及处境，也无根本性改变。

世人对刘传新非议责难较多的，还有就是他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的表现。尽管他是当年周恩来信任并委以重任，高升起来的，但在周与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的矛盾

激化并公开化后，他站到了后者一边。

1976年[明前后，因悼念周恩来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中，刘传新不仅组织全部警力，卖力镇压广场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追到了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方将帅头上。据说h及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邓颖超、胡耀邦等30余人。刘传新这是把绳索往自己脖子上套，他最后的下场已经注定了。

几个月后，“四人帮”垮台，刘传新顿觉大祸临头。果然，北京街头很快出现了类似《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这样的大字报及漫画等。

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当年5月18日，刘传新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刘传新虽死，但北京市公安局在任领导班子的“文革”所作所为，仍要[算。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正式“清查四人帮在市公安局的罪行”。对刘传新以下的班子成员，也来了个“一锅端”。二把手，军管会副主任王更印，副局长单春林被隔离审查；另外三名副局长被宣布停职检查。

同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9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复出，担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1977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的“文革军管”，才正式划上句号。

□ 原载《共识网》2013年03月20日

~~~~~

## 【亡灵祭坛】

“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的一生

• 彭洁清 •

〔作者彭洁清系姚桐斌夫人——编注〕

### ◇ 穷人家的孩子考第一

姚桐斌1922年出生在江苏无锡黄土塘镇，读完小学后，由于家境困难，父亲不想让桐斌继续读书，可是校长十分喜欢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数次来到姚家劝说：“像这样好的学生实在可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终于同意让桐斌上无锡县中学。

上中学后，家里的开销更大了，桐斌不得不辍学。父亲给了他一点资金，让他在镇上摆个小摊，卖点香烟、火柴、袜子等日杂品。两年后，他带着一点点积蓄来到上海读高中。由于缴

不起住宿费，他只好睡在教室里。

此时，上海和无锡都先后沦陷。桐斌不愿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便瞒着父亲，和四位同学越过日军的封锁线。1939年他终于到达江西省吉安县，考进了国立十三中的高中部。

桐斌读书十分用功，毕业时，在江西全省会考中，取得个人总分第一名。

桐斌报考了五所大学，均被录取，他选择了当时迁往贵州平越的交通大学。

桐斌上大学时勤工俭学，为校方做些打扫试验室、分发邮件等工作，还为一名高中毕业生补习物理，以补助生活费。1945年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46年桐斌参加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公费留学考试，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桐斌看中了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

#### ◇ 欧洲十年

伯明翰大学于1947年秋迎来了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国青年——姚桐斌。他选择了在工业冶金系攻读博士，师从国际铸造学会副主席、伯明翰大学终身教授康德西博士（V·Kondic）。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垮台，1949年桐斌已没有公费，只好把两年的费用匀作四年使用。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桐斌仍然于1951年获得冶金学博士学位。

1952年1月，桐斌在英国伦敦帝国科技学院任实习指导员，并继续深造，1953年即从该学院毕业，并获又一学位，同时还在该学院任教和做研究工作。

在英国留学时，桐斌组织参加了进步的“中国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的工作并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主席等职务。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桐斌和海外留学生激动万分，他们向国内发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并得到了回电。

1954年初桐斌赴亚琛大学报到。他扎实严谨的学术基础和工作作风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亚琛大学期间，桐斌写过多篇关于金属粘性及流动性的论文，并自制仪器研究金属粘性，他的工作获得了好评，被好几个国家的大学邀请讲学。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宣传社会主义祖国，他要让人们在了解他的学术观点的同时也了解新中国。在此过程中，桐斌自己也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受到了党的教育，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 十二名大学生起家

1957年底回国后，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都希望桐斌能去他们那儿工作。但后来，聂荣臻元帅通过国务院专家局，指名要桐斌到成立不久的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五院）工作，负责筹建一个研究所。

桐斌来到了第五研究院的材料研究组（后来扩建为研究所）。那时该组只有12名大学毕业生。每人一张三屉桌，除了一台ROW立式金相显微镜外，没有其他仪器设备。当时有人问这位归国专家为什么要到这么一个小单位来工作，为什么不去大学当教授或去做更重要的工作时，他回答道：“我回国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建设。因此，我愿意在基层做一些具体事情。愿意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

七零三所的任务是研制火箭材料和工艺。一枚火箭有很多分系统，每个分系统又有数以万计的元器件、零部件，因此火箭材料成百种，上千项，包括金属、非金属、有机材料、无机材料，等等。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材料工业水准不高，连一些低合金钢都生产不出来，更谈不上航天材料了。因此，火箭材料的研制均是从零开始。

在研制出这些材料及其相应的工艺后，还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接近火箭使用条件的试验，如高温、超低温、振动、密封、烧蚀、腐蚀、老化等，其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

七零三所后来调来一批大学毕业生和一些留学苏联的博士生，但是他们实际工作经验不多，为了帮助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成长，桐斌付出了巨大精力。他亲自讲课、指导，还从外单位请专家来传授知识。冶金界的元老李熏博士和两院院士师昌绪先生就到七零三所讲过课。

桐斌要求技术人员做完实验，必须写详细规范的科学技术报告，他亲自审阅七零三所的每一份报告，并作批改。一位高工满怀深情地回忆：“姚所长对我们的报告看得可仔细啦！技术方面不必说，哪怕错了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也都改正过来。我至今还珍藏着姚所长在我一份报告上的批示。”

◇ 研究=re+search

为了培养这些科研人员，桐斌写了一篇文章《研究工作方法》。钱学森对此文非常赞赏，评价极高，认为此文对整个导弹研究院的科研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推荐在院刊《研究与学习》上发表。

《研究工作方法》一文强调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树立和培养科学的态度、作风、秩序和程序。文章指出：在进行任何一项研究工作之前，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有调查研究，有科学分析，有作业计划。在研究过程中，试验要系统地进行。试验后，要有分析、总结，找出规律和写出科研报告。

在关于试验研究阶段的论述中，桐斌特别强调两个环节：

一是要认真细致追寻重要线索，解决主要矛盾。什么是研究，他风趣地说：“在英语中，研究（research）一词的词根 search，意为寻找；词头 re，意为重复。可见，研究的过程就是反复寻找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只有弄清难题所表现的各种现象，才有可能找出主要矛盾，使难题迎刃而解。”二是要有条理，一丝不苟。

桐斌还特别指出：“在报告的附录里，应将参考文献的名称、作者、来源等按照引用的先后次序列出，其顺序号应与文中引用时附注的顺序号相符合，以便阅读者可按参考资料来源寻找原文。”“在编写研究报告及技术文件时，应保持客观的科学态度和诚实的作风，凡引用别人的论着时必须加以说明，自己的意见必须与别人的严格分别开来。”他还要求各级技术领导对于重要的文献资料依据，必须亲自复查。

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至今被许多同志视为“仍在熠熠生辉”的“宝贵的知识和精神财富”的这篇文章，在“文革”中竟然被当做毒草来批判。但是沧海桑田，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2000年，七零三所将此文精印成册，作为必读的教材发给该所新来的科研人员。

#### ◇ 预研课题 80% 用上了

桐斌主张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当前研究和预先研究。他认为材料研究应先于火箭设计试制，不仅应考虑现有型号的火箭材料，同时应开始为新型号的火箭材料作准备。

桐斌列举了当时苏联和美国火箭技术发展的经验后说，研究与发展所需周期较长，设计与生产所需周期可大大缩短。因此，桐斌主张加强预先研究，要有技术储备。

桐斌多次强调预先研究的重要性。他多次以开饭馆为例向所内人员说：“设计人员好比顾客，他点一道菜，你说，我还会不会做哪！我还要去买肉、买菜、养鸡下蛋，那怎么成？你这个开饭馆的必须事先摸清顾客想吃什么，事先准备好肉、菜、蛋，事先学会怎么炒出来。这样顾客点了这道菜后，你不就马上能够拿出来了吗？”

从 1961 年到 1964 年，七零三所共开展了 500 余项课题研究和技术攻关，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封锁。

桐斌领导和指导高温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课题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结构。他领导研究的钛合金高压容器一直在我国历代航天产品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对减轻火箭结构重量，增加卫星有效载荷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将其成果应用到火箭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为我国火箭及卫星研制提供了材料保证。

20 世纪 80 年代曾做过一个统计，当年桐斌主持提出的预先研究课题，约 80% 已用在火箭型号上了。

#### ◇ 血洒“六·八”

1968 年 6 月 8 日，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那时在大学教书，星期六，是我回家的日子。一周来，我天天盼望回家。每个星期一，一到学校，我就开始在日历上，一天撕掉一页，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我可以和桐斌见面了，万般情意涌上心头。桐斌一定也是翘首以待，盼望着我们六天一次的相聚。吃过午饭，我急急忙忙地离开学校，两个多小时以后，我终于挤上了从永定门往南开的公共汽车，急急忙忙往家赶。

我们的家在 35 栋三楼，一走进过道，就是一个客厅，一个长沙发背靠窗，面向门。桐斌总是让客厅的门开着，坐在沙发上。这样，我一到家，他就可以看见我了。

到了楼下，我快步往上走，满怀希望，“现在已是 5 点多了，也许桐斌已下班，在沙发上等我”，想到这里，我三步并两步地往上跑。当我登上三楼时，家门忽地打开，我家的保姆啜泣着对我说：

“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什么？你说什么？”

我感到一阵眩晕，听不懂她的话，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

天哪！这不可能是真的！绝不可能！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拉住了我哭成一团。她们扶着我进了客厅，一见桐斌，我便猛扑过去，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桐斌的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面对着这令人心碎的景象，我终于醒悟到，这不是噩梦，而是残酷的现实。

这几天桐斌在家休息，每年5月他就患花粉过敏症，鼻涕眼泪的，不停地打喷嚏，还发烧，医生为他打了针，让他休息。

我向桐斌建议，到我们学校去避几天，那里离中医院近，不如去医院检查一下，也许中医对这种过敏症有治疗办法。但是，桐斌不同意，说是6月初有一个重要会议，只要能起床，他必须去参加。后来，桐斌还是带着好些条手帕，抱病去参加了会议。

6月8日早上，桐斌手提一热水瓶开水，骑着自行车，按时上班。一进办公室，他就开始擦桌子，扫地，泡上一杯茶，然后静下心来办公。

快12点时，桐斌收拾办公桌上的书籍文件，准备回家吃午饭。这天去办公楼上班的人不多，有两位七零三所的工程师，见到桐斌，急忙打招呼：“姚所长，您还在‘抓革命、促生产’啦！外面都有人在武斗了，您还是等一等，先别回家。”

“谢谢你们的好意。上午我只批完了一个技术报告，吃完饭还得回来接着干。再说，武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现在七零三所仍然保存着桐斌于1968年6月8日在技术报告上的批注，这是桐斌最后一次签写他的名字，竟成为他的绝笔。

一进家门，孩子们立即围过来，“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桐斌洗完手，亲了一下跟在后面三岁的小女儿，抱着她走进饭厅，还未坐稳，传来一阵粗暴的捶门声。

“开门！开门！”

咚咚咚！“到底开不开门？”

正当桐斌走到门边时，门已被钢管砸开，一伙人冲进来。

“请问，你们找谁？”

“妈的，找的就是你。干嘛磨磨蹭蹭不开门？”

接着一阵噼啪的耳光。

暴徒们骂骂咧咧地将桐斌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在楼门前，一个暴徒上前左右开弓又是两个耳光。这样还不解恨，眼镜，那副伴随桐斌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眼镜，在显微镜下，在熔炼炉前，就在一个多小时前，还用它阅读关于我国将要试制第一颗人造卫星文件的眼镜，被一把从桐斌脸上抓下，扔在地上，踩得粉碎。

在中国，往往将眼镜和知识分子连在一起。那时，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臭老九”，是“反动学术权威”。人们受的教育是：知识分子不会做工，不如工人；不会种地，不如农民。因此，他们从心里厌恶蔑视知识分子，将憎恨发泄在眼镜上，发泄在桐斌、留过洋的博士身上。

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嗥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



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可是这些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并未就此罢休。

“站起来！装什么蒜？你又没死！”

这些没有心肝的家伙，硬是把桐斌拖到他们的“总部”。此时，桐斌已不能讲话了，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后即倒在地上。头头们见状，就吩咐手下的人：“把姚桐斌搞走，别让他死在我们这里！”

那几个人把桐斌拖到我家楼前人行道上，向他猛踢几脚，还故意大声嚎叫：

“起来，别装死，自己滚回去，难道让我们抬你上去不成！”说完便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地上的桐斌，立即跑上楼找我家保姆。他们请求将桐斌送到医院抢救，七机部下属的七一一医院离我家不到四分之一里路，但得到的答复是：

“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邻居只好把他抬上楼，放在客厅沙发上。由于头部几处受重伤，桐斌一直未恢复知觉，于下午3时许停止呼吸，惨死在家中。

#### ◇ 炼狱四日

这一夜，几个孩子和我挤在一张床上，她们哭着哭着睡着了，我又怎能入眠。漫漫的长夜，终于熬过去，朝霞从窗口射进，6月9日来临了。两位军代表，一高一矮，后面跟着几位解放军战士，抬着几大桶冰块。他们将冰块放进浴缸，把桐斌的遗体从客厅里抬出来，放在上面，四周又堆放了许多冰块，然后将门窗紧闭，以保持浴室低温。

10号晚上10点半，军代表领着两个人直奔卫生间，他们是法医。

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从卫生间出来，两位法医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没说一个字，但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对我遭遇的深切同情。

矮个子军代表对我说：“快12点了，您去休息吧！明天还要送到海军医院进行解剖。”

“解剖？”我不解地问。

法医很温和地解释，在我家，他们只做了初步检查，只有在医院里做解剖，才能详细地检查。说完，他们四个人离去。

我独自坐在沙发上，思潮起伏，不能自己。

桐斌！你在世时，一直以工作为重，哪天有过空闲？现在你闲下来了，躺倒了，休息了，却是永远的休息，再也不能对我微笑，与我谈心，和我爱恋。

我们享有爱情和幸福，但却被魔掌残酷地夺走了！

忆以往我泪如泉涌。

#### ◇ 革命烈士证明书

桐斌惨遭杀害后，我几次向军管会要求尽早做出政治结论，但军管会一再说，七机部的情况复杂，要我耐心等待。

我找过几次七机部的领导都没有结果，直到宋任穷被任命为七机部部长。像以往一样，七机部换了新部长，我就去申诉。

1978年初，我给宋任穷写了一封信，说要找出杀害姚桐斌的幕后策划者，看来一时难以实现，我要求先给桐斌做结论，追认他为烈士。

宋任穷将我的信上报中央，并在五届人大会议期间，当面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举行追悼会。经中央批准，追悼会定于1978年3月18日召开。这一天也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

追悼会虽已开过，但谁知道以后会不会还有“文化大革命”？谁知道孩子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政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多方奔走上告，要求有一个书面证明。直到1983年，才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京烈第080040号“革命烈士证明书。”

在证书旁有一栏详细记载其中牺牲时间、地点、原因：“1968年6月8日无辜遭到坏人毒打，不幸牺牲。”

我将“革命烈士证明书”复印了几份，每个孩子一张。立存此照。

#### ◇ 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99年9月18日，北京天气晴朗，天安门广场的国旗迎风飘扬，蔚蓝的天空上飘浮着几朵白色的浮云，将五星红旗衬托得分外美丽。平日中外观光客多不胜数，但那天偌大的广场静悄悄，只有解放军在那儿站岗。

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在隆重举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奖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该会，江泽民主席亲自为这些“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佩戴奖章。江主席号召大家学习这23位功臣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江主席说：“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在这次会上桐斌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当江主席讲话时，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对桐斌说：“坏人可以扼杀你的生命，但是你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不久前，一位记者和我与某副部长在谈到桐斌时，已离休的副部长对桐斌的评价是：姚桐斌同志的一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无私奉献”。他即使在受到不公平批判，受冤屈时，也不闹情绪，照样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这体现了他高尚的情操。他在国外有地位、有名誉，但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回到祖国，难得啊！

这位前副部长说，“姚桐斌同志为我国航天材料及工艺打下了基础，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当之无愧的。”这位老干部的话掷地有声。记者连声说“您说得好！您说得真好！”

□ 摘自《人民网》

~~~~~

【恐怖岁月】

方忠谋被儿子出卖而死

• 汪海涛 •

张红兵，北京市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八十年代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是今天中国典型的成功专业人士。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他在安徽省固镇县文物听证会上无比沉痛地说：大庭广众之下，我愿意再次解剖自己卑微的灵魂，公开地向在文革中因我告发而冤死的母亲方忠谋忏悔、道歉：“妈妈，我对不起您！”

张红兵的陈词是要保护母亲方忠谋的坟墓以免于被拆毁。他请求把方忠谋墓地列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范围，作为不可移动的文物，确定为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母亲在家中严厉批判毛泽东

该墓地是张红兵母亲方忠谋遇难地，她母亲在文革中，按照毛泽东指示进行家庭文革形势辩论，却被长子的张红兵向当局告发，导致母亲被枪决的惊人冤案。

被大陆网友称为“安徽张志新”的方忠谋生于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九年加入解放军，一九五〇年转业从医，文革前为安徽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她的丈夫张月升任固镇县卫生科科长、党总支书记，文革开始成为走资派，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被打得尿血，方忠谋曾被拉上台陪斗；她的女儿在红卫兵串连中病死，方忠谋身心受到严重创伤。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身患高血压病、心脏病的方忠谋被扣上“特务嫌疑”、“地主分子”的帽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

方忠谋把她对文革的怀疑和反感在家中辩论时坦白讲了出来。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三日夜晚，方忠谋在家中与丈夫儿子辩论时说：“我就要为刘少奇翻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搞的，毛泽东偷梁换柱，安在刘少奇身上。”她还责问：“为什么苏联从前和我们友好，现在除了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共产党外，其他国家那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都是修正主义的？修正主义不是别人，恰恰是你自己！这是毛泽东搞的。”

她批评道：“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像？！”还挥笔写下这样的话：“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宣布立即撤销毛泽东党内外一切职务，叫他靠边站”；“为了继续革命工作的须（需）要，立即宣布解放刘少奇等同志，恢复少奇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为了巩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果，有（由）彭德怀重新教育我军战士。”“要解放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解放刘少奇、李葆华、邓小平等等，要立即宣布。”当夜，方忠谋还撕毁了贴在室内墙壁上的毛泽东画像然后烧毁，并高呼：“共产党万岁！”

◇ 儿子告发并要求立即处死母亲

当年才十六岁的张红兵是一位对毛泽东无限愚忠的中学红卫兵。他与父亲张月升觉得母亲的行为非常反动，当场对母亲进行批斗。随后他和父亲先后报案，准备将方忠谋扭送县公检法军管组。张红兵举报时，写了《检举揭发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方忠谋罪行》材料，详细记录下该日他们全家如何辩论他母亲如何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全部过程。

最不可思议的是检举信竟然要求对母亲方忠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份检举材料成为方忠谋反革命的确凿证据。

因为儿子、丈夫，后来还有方忠谋亲弟弟的揭发，方忠谋于当夜被县军管组羁押。十四日军管组报告县革委会，经过层层领导讨论决定，以“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翻案”等定罪，十五日对方实行拘留，二月二十三日正式逮捕。方忠谋关进县看守所后，在审讯中继续谴责江青是“美女蛇”，表示“打算去北京找江青算帐”，“算她给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帐”，说江青“是踏着人的肩膀上来的，害了多少革命同志，害了多少红卫兵小将。”她还继续批评毛泽东，说“他把历史车轮倒拉二十一年，我要把它颠倒过来”。因方忠谋顽强不屈，被认为反动透顶，报经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方忠谋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一日遇难，死年四十四岁。离她儿子的举报仅两个月。

而儿子则因革命立场坚定受到褒奖。一九七〇年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在固镇中学举办，展出了《大义灭亲——固镇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有四幅绘图，分别配“家庭批斗会”、“检举揭发”、“县医院斗争大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文字说明。

◇ 母亲“众叛亲离”英勇就义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固镇县革命委员会公安局开具证明：“张红兵同志（小名铁夫）原生母方忠谋于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三日深夜在家中搞反革命活动。当时张红兵与现行反革命份子方忠谋进行了坚决的勇敢的面对面揭发和斗争，立场坚定，表现很好”。

在方忠谋被送上刑场前，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为了家人不会在政治上受到牵连，征求两个儿子的同意后，提出与方忠谋离婚。固镇县公检法军管组在四月八日签署了离婚书。方忠谋这位正直勇敢的女子在亲儿出卖，家人离弃下孤独悲凉地走上了刑场。

据张红兵讲，他吃狼奶长大，中毒很深，醒悟很迟。他说自己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经历了痛苦的反思、人性重新在心灵中复苏的漫长过程。一九七九年，以张志新平反为标志的复查冤假错案的社会浪潮席卷全国，在姨母方佩兰、舅父方梅开（方忠谋胞弟，也参与检举过方忠谋）的推动下，大梦觉醒的张红兵怀着沉重的负罪感，写出了关于母亲案件的申诉；经过亲属们的共同努力，方忠谋冤案得以提起再审。一九八二年二月，张红兵和舅父方梅开等经走访亲历者多人之后，找到方忠谋遗骸掩埋地的大体位置，然后买下这块土地，建坟立碑作为母亲方忠谋的永久性墓地。并因为母亲的悲剧典型地见证了毛时代的残酷和灭绝人性。张红兵要求将母亲的坟墓作为安徽省文物予以永久保存。

他说，他希望“让人们汲取历史教训，避免这类灭绝人性的家庭悲剧重演！我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忏悔，不怕成为‘反面教员’，也不怕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 儿子终于告别兽性回归人性

在多次有关听证会上，张红兵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回忆了这段血泪家史。他说：“这是一段渗透着我的家人鲜血和泪水的往事，不堪回首。为此，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曾与无言的母亲相会，并从睡梦中哭醒。我这个吃着‘狼奶’长大、曾经铁石心肠、六亲不认的‘狼孩’，几经磨难、内心熬煎，逐渐与‘兽性’告别，脱胎换骨，从虚幻的天国回归现实世界，皈依了伟大的人性。”

他在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的听证会上说：大庭广众之下，我愿意再次解剖自己卑微的灵魂，公开地向在文革中因我告发而冤死的母亲忏悔、道歉：妈妈，当年，作为儿子的我不应当这样做；我对不起您！此一失足，刻骨铭心；“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同时我还要声明：属于包括我在内的家庭成员责任的归我们自己，属于社会责任的归社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后者。

借此机会，我还要向因我告发而失去妻子、在文革中被我贴过大字报、已于二〇〇三年一月不幸逝世的父亲道歉：当年，作为儿子的我不应当这样做；我要向因我告发而失去母爱的弟弟道歉：当年，作为哥哥的我不应当这样做；我要向因我告发而失去姊妹亲情、并被我疏远乃至伤透了心的姨母、舅父道歉：当年，作为外甥的我不应当这样做。我还要向在文革中被我贴过大字报、原固镇县实验小学的刘祥祯校长道歉：当年，作为学生的我不应当这样做；我还要向在文革中可能因我的盲目幼稚行为而受到伤害的所有人道歉：当年，作为一个少年的我，不应当这样做。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站在这个听证会上，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为自己有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我要大声地说：“妈妈，我爱您！”

这个出卖母亲的中学红卫兵为他少年时代的幼稚、盲从、愚昧和人性泯灭，已公开作出了沉痛的忏悔。他母亲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安慰。但那个把中国青少年教育成狼孩子的共产党仍然是伟光正，那个唆使青少年作恶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头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段黑暗的历史的罪恶仍然被包藏被禁止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死于毛泽东暴政下的方忠谋能够瞑目吗？张红兵为他当年的失足承担了他的责任，但制造这个悲剧的中国社会，是否承担了该有的责任？

一位网友看了张红兵的陈词后，感叹道“方之死，与胞弟方梅开、大儿铁夫（张红兵原名）、丈夫张月升有直接关系，是他们告发了方，一个家庭着魔般的卷入政治生活，互相残杀，令人心惊，这个疯癫的家庭就是那时中国的缩影。一些鼓噪重回文革的人，要不是文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弱智。”

□ 原载《开放》2013年第3期

~~~~~

## 【劫后反思】

我“斗”了我爸爸

• 傅靖生 •

◇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代中国人呱呱坠地后大多会有三次庄严，第一次是九岁，在五星红旗下戴红领巾。至于什么是主义？似懂非懂，好玩而已。

第二次是少年，面对团旗宣示：“为解放全世界 2 / 3 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一次，意味着灵魂像石膏流进了胶模，定型了。

我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因为品学兼优，任少先队大队长，不满十五岁就入了团。一路走来，一路优秀。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我是团总支宣委。到了电影学院，自然成了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兼院火炬报主编。

现在，我冲刺第三次庄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1 9 6 4 秋，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

我怀着赤子之心向党写了申请书，坦诚地说明自己出身：生父是国军将领，四九年逃往台湾。在我沦落街头的时候，现在的爸爸收养了我。从此，我心有奋斗目标，行动则以雷锋为坐标，每天都狠斗私字一闪念，并且，一周递交一次思想汇报。

很快，摄影系党支部书记 W 找我谈话说：你和党越来越近了，要好好努力啊！你很有希望。学雷锋做好事，只停留在表面上，雷锋的本质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书记的话具体体现党的领导，让我感到心里真温暖，深深鼓舞着我。不管要做什么，先看毛主席怎么说，我再怎样做。

#### ◇ 老子反动儿混蛋

电影学院在新街口外大街 2 5 号，是完整的苏式花园建筑。贯彻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最有效的莫过于直观教育，现在的大课是斗争反动学生。

大礼堂全校师生群情激奋，高喊：打倒反动学生郭宝昌，吴天忍，刘文田！郭宝昌的主要“罪行”是散布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他虽然是被收养的，但是成长为同仁堂的继承人，所有言行就都打上阶级斗争的烙印。领导宣布决定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口号此起彼伏，公安干警将三人押下讲台。这位日后的大导演被强弯着的身影消失在大门的逆光中，前往南口农场。

有句成语叫“敲山震虎”，我不是虎，要是虎，也许不怕震。我像鼠，我胆小如鼠。这一震，让我一天到晚在想我究竟是谁？我看我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别人看我是混入团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每晚我会被同一个恶梦折磨，生父黄健发猛力，把我从云端推出，我落呀落，速度越来越快，直到我惊醒。一身虚汗后想到自己无法改变的出身，前途如断崖，感到绝对的孤独。我想，雷锋的所做所为，我可以学，但是，他压根儿是穷人的胎，天生就是革命的坯子。他有家仇，阶级仇，地主还乡团来了，他就要受二茬罪。用金庸复仇主义的思路看：他是毛家庄的，我是蒋家庄的，水火不容。

我渴望把自己挪到毛家庄来，也用阶级分析：“生母章倩萍出身贫民，1 9 4 0 年被万恶的地主黄健抢占了，这就是家仇、阶级仇啊！”好像找到透气的缝了。可是，按照土改前三年为划分标准，广西 1 9 5 0 年土改，我妈还是个地主婆！”人走投无路的时候，阿 Q 能缓解接近崩裂的精神。尽管那时鲁迅超级火爆，是文革旗手。但是，这次学阿 Q 越学越绝望。很快，敌我的观念在同学中发酵，不久，我就挨了乱拳。

这一天，春光明媚，在宿舍楼 4 0 8。同学 Z Z P，拿着暗袋找我：阿傅，你帮我看看，

我的暗袋是不是漏光？我天生助人为乐，加上学雷锋也就有了一篇好日记，我当然愿意了。二话不说，我把暗袋套到自己的头上，钻进黑洞，仔细查验。没想到一通乱拳就打过来，噼里啪啦，像暴雨！我眼冒金星，不顾一切扒开暗袋，看见了三张脸，除了Z，还有J和C。他们在微笑，若无其事，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相信在黑暗中错过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表情。我脸的红肿了，我忍了，有句话，小不忍则乱大谋，因为，他们等我回击。

接着猛戏就来了。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检阅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上，他给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改名叫宋要武。第二天，一列红卫兵闯进电影学院，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你要是敢说党不好，马上让你见阎王。你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你要是不革命，就罢了你的官！滚你妈的蛋！”这些来自自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清一色的高干子弟，北京人谈虎色变：腰中的军官皮带扣是方的，锐利像刀，只要出击几下子……已经打死了很多人……

他们在影壁上贴出了硕大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原来，我大惊失色，原来我挨了乱拳，是因为我与生俱来是混蛋。

传说作者是高干子弟谭立夫。

全校都集中到礼堂，在革命的威慑力下没有人敢不来。台上，一位飒爽英姿的女红卫兵大声命令：“文艺院校彻底烂掉了，凡是出身不好的人都上台来报到！”

我蒙了！记不清有几个人上了台，说了些什么。我只想我怎样交代？如实说，会不会被皮带抽得皮开肉绽？打马虎眼，是不是会有人上台当场揭穿？我的屁股一个劲向后移，但是脚就是不听话。忽然有女生上台说：我反对！女红卫兵：你叫什么？是哪个学校的？女生：我叫杨其韶，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红卫兵来回甩皮带：你是什么出身？杨其韶：我是三代贫农。女红卫兵：你反对什么？杨其韶：我认为，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大家都生长在红旗下，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同学是热爱毛主席的。

趁着气氛缓和下来我蹭出了礼堂，下了台阶，越走越快，逃出了大门。不知不觉到了护国寺一个小饭店，空肚子喝一瓶香槟酒，天转地也转，差点倒在马路中间。人生我第一次喝酒，记住了酒后的恶感，也就永远不喝酒。

杨其韶，长长的辫子，瘦尖的脸庞，身材秀美。在美院附中我高一她高四，她救了我，她是我的救星。

一年后，1967年7月16日，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大学生横渡八一湖。忽然，狂风大作，卷起了八米大浪，四个美院的学生不幸被拍中身亡，其中有杨其韶。八一湖西侧当时是坟冢，现在是三环。46年来，我无数次经过八一湖，没有一次念悼杨其韶。遗憾我未能对她说：谢谢你。

杨其韶说的对，我傅靖生就是热爱毛主席的，我是红色的，我改名叫付红。现在，毛主席直接领导红卫兵了，党呢？瘫痪了，我渴望加入红卫兵像渴望入党。当然不会吸收我，我就自己做红袖标，不敢印红卫兵，就印共产主义红艺兵。我把鲁迅的石膏像的胸前嵌上毛主席像章，浑身热得不知怎样才算是革命了。我无限崇拜毛主席，一点都不假，终于，有一次毛主席接见，被我赶上了。

三米高的标语牌，一个字要八个人抬，我被分配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鸣”字下面最边上，在马路最南端。我的眼睛是2.0，离天安门最远，却看得最清。毛主席在天安门东南

角，摘了帽子向下挥手，我激动直抖。队列边向前，我边向后扭头，一直扭到100度。我自己对我自己说：要是反动地主官僚的爷爷，生父站出来，毛主席只要一挥手，我会挥大刀向他们头上砍去！

毛主席挥手就是有力，革命要有敌人，人人都在找敌人。

#### ◇ 我为什么爱广角镜头

8月25日早晨，我照旧在太平湖跑步，远远地，看见有数十人围在中堤叽叽喳喳，像是有人投水了。议论随风飘来：是谁啊？是老舍，跳水了。那是畏罪自杀！快来啊！臭老九自杀啦！……

人越围越多，我不敢见死人，扭头出了太平湖。在护城河转悠着看城墙，到了西直门又转回来。路经演员剧团门口，院子里黑压压地围着外地串联的红卫兵，有人喊：抬起头来，低头就是公然对抗文化大革命！原来是造反派拿女明星X和Y示众。这次批判有特色，革命者可有三个动作，一：口号，二：啐吐沫，三，拧敌人胳膊上的肉。舒服啊！痛快，毛主席说：“……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有人踏上去滚一滚。”所以，意淫的快感也是有合理依据的。

革命要有理由，哪怕为所欲为。

我磨叽到正午，相信学院食堂已经没人，可以躲过白眼下的飞沫。没想到我错了！

买饭的窗口只有我，没看见北窗阴影下有三桌人。

“我要个榨菜炒肉丝！”话音未落，同学门呼啦围上来冲我砸拳，为首的是表演系的同学ZY和ZJM。

啊……啊……啊！我边喊边退，革命同学边打。我退过排球场，在医务室的回廊下倒下了。脚踢代替了乱拳，我蜷着身子护着头接着……啊……

此时，在回廊的东侧，是通向大门的方向，来了一位同学W。他高声问：打谁哪？有人回答：打狗崽子付红哪！他高喊：打得好，该打！

眼看他在地平线，小小的，径直冲过来了，迅速变大，朝我的头踢，撞我太阳穴的是一双皮鞋，我昏了过去。

低角度，瞪圆了自己的双眼到最大视野，（是广角镜头啊！），拍摄物由远到近，一直冲到眼球（镜头）的表面，这就叫冲击力！我有亲身体会，在电影中就特爱用广角镜头。毛主席说得真对：“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

W姓同学在美术系，他而且是美院附中的同学，算得上少年同窗。此时，他的父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他革命这样急匆匆，想必也是要摆脱窘境，合理。如果他也学雷锋写日记，一定会这样写：“今天，我朝狗崽子傅靖生踢出革命的一脚，相信大家已经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 ◇ 我斗了我爸



雷锋有名言：“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我卯翼在少数派联委会里，因为他们以我为同志，我感到了温暖，他们相信我能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

可是，对台湾海峡那边表态是水中捞月亮，划清界限要我面对养父傅博仁。

1954年5月的一天，10岁的我在大街上流浪，一位解放军走过来，他就是傅博仁，时任高等军事学院的工兵教官，在金华军事演习。他笑眯眯地把我抱起来问：想不想跟我走，当我的儿子？我满口答应。摸着大檐帽上带八一五角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我第一次感到尊严。一周后，我坐上载满坦克的军列北上南京。从此，不再有人朝我吐唾沫，骂我是国民党姨太太的拖油瓶。也不会被生母拽着我的头往墙上撞，拿我宣泄对丈夫的愤怒。到了南京，妈妈陶庭弼帮我搓澡，笑眯眯地说：你是不是从来不洗澡啊！我乐，是真正的童乐。我说我要画油画，爸爸就带我去新街口百货大楼，我错要了戏剧油彩，画永远不干，他也没批评我。从小学，初中，美院附中……我不再野，只要我上进，爸爸就支持。

但是，主宰我的却是以下信息：国民党少将傅博仁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大学。曾代表国民政府接收杭州，秋毫无犯，国府廉洁的模范。上海战役前任上汤恩伯的工兵司令，主修上海周围的碉堡工事。虽然，他已经被策反，工事按照陈毅元帅的意图改修，但是陈毅也反毛主席被揪出来。

想到这些，我决意要造他的反。尤其是我找到了证据，养母用旧的青天白日旗为我做裤衩，上面还留着星角的残影。

有红卫兵S Y Z陪同证明，八个小时的火车我到了济南。建委和街委会红卫兵围了一圈，爸爸，妈妈低头站在人群中间。大家一阵口号过后，接着就是我在愤怒，我挥动蓝裤衩，揭发他们保留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录，里面不是侵华日军的头目，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阀，这是幻想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然后，郑重地宣布和他们断绝父子关系。

最后，妈妈细声地问我：以后还给你寄钱吗？（此前，每月他们都给我寄25元钱生活费）我怒斥道：谁要你的臭钱？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我少年时生长的院子。

要想继续革命，还要对自己的爱情，现在检验我和赵衡的爱情是否纯洁，是不是真的像马克思和燕妮。这要看是不是能和岳父，岳母划清界限。既然毛主席说文艺界稀烂了，就要紧跟。实在没有类似蓝裤衩的理由，就硬扯黑帮的连线吧！把岳父赵瑞蕪、岳母杨苡和黑线人物贺敬之、蔡若红、巴金、袁水拍都加扯在一起，要他们老实交代他们的黑关系。很快，一张黄纸黑字的大字报就寄到了南京师范学院，变成了斗争杨苡的炮弹。

革命像瘟疫，由一个传染给另一个，因为我的传染，赵衡在单位也拿起笔做刀枪了。抖掉自己身上的耻辱，把耻辱转嫁给另一个人，人说：白眼狼，铁石心肠。上帝要是来纠错，会说：不，是红眼狼！

毛主席说：“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现在，我也想串联。秋凉的时候，我和同学G，L，C串联到武汉串联。看完长江大桥，住到了武昌长春观旁的小旅店。长春观里贴满了大字报，全是道士相互揭发怎样和道姑有染的故事。大家有感而发，深深佩服毛主席的文革可以铲掉人间三尺淤泥。

回到房间还没进屋，没想到我又遭遇当头一棒，门口贴了一串通缉我的传单，赫然醒目：现有我院狗崽子傅靖生（付红）其父是台湾的反动军官，借串联的名义，流窜各地，破坏文化

大革命。知情者请联系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红卫兵。通缉中还有其他五名同学，我的出身是第一坏。革命最终也没有放过我，毛主席发明的群众专政辐射四海。

◇ 原来如此

1967年冬，美术系X和N等同学画的“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问世，毛主席头像叠在太阳上，着统帅服，笑呵呵的，一列各色的世界人民在下举手庆贺，宣传画在全国发行。革命在深入，公安六条在公布近一年后，几乎成了杀无赦的尚方宝剑。其中第二条“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和第四条“……敌伪的军（连长以上）……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组织……”，加之外逃，我是没跑了，至于没坚持反动立场就说不准了，说你反动就能找出你的反动依据。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狂潮中，同班同学陆海炳被捕入狱，罪行是放大照片的时候，切掉了林彪的半个脸。农影的高班学长郑邦昌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毙，罪行是在日记中攻击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没有人同情他，都认为活该。要想自己不被清理，就要努力清理别人。毛主席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要是把人比成鸡，全国所有的鸡几乎被开水褪了毛。夫妻反目，父子交恶，朋友翻脸，相互揭发，人人自危，只为忠于一个人，神坛上的毛泽东。

有一天，中央派人来到学院向两派负责人宣布：“学生MBY，他的父亲是我党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下党员，不幸被发现，光荣牺牲了，现在宣布他为烈士子弟。”有了至高无上的认知，从此他从狗崽子中出列，挺直了腰杆，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消息传出，深深刺痛了我，在以后的半个月中，我爱在学院门口溜达，干什么？见着陌生人就问，是不是中央办公厅的？我希望有人也来宣布我的生父黄健也是地下党员，被蒋介石枪毙了。人在无望到顶的时候会制造希望，现在叫幻想症，我不嘲讽自己，我是真的以为有可能。

很快，到了文革第三年蝉鸣的盛暑，毛主席下达“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工宣队举着大旗冲进了校园。这次，是以抓516为理由，用工人整学生，不管是哪一派，凡是积极参加文革的头头，都开始了漫长的煎熬。

岳父赵瑞蕪曾对我说：人在不经意的时候听到陌生人的两句话，人生就会茅塞顿开。

最后一声蝉鸣过去之后，这句人间真谛灵验了。一位人事的长辈告诉我：……傅靖生，你是外逃反革命的家属，是党的内控对象，共产党是绝对不会要你的，这是党内的规定……

原来如此！像观音菩萨点化孙悟空，我被点化了，我明白了……明白了什么？我明白我错了，明白物种都是分类的，人起码也分百类。我是哪一类？只不过是个卖艺的。我本该有自知之明，我却误以为我可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滑稽。从那时起，我和人群渐行渐远，埋头创作，我从此被边缘，边缘是我的宿命。虽然历尽沧桑，却是我的本分。

可是，我潜意识中一直隐藏着忐忑不安，直到2005年，国共宿敌的后人胡锦涛和连战握手言欢，8年有15次。我的心才踏实了。我居然能对人讲：我的生父，养父都是抗日的战将，真不可思议。

历史浑浊的长河等到了清水时。1996年，我应聘导演《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党委书记谭斌是出品人，我惊诧他就是谭立夫。我还没来得及谈对联，他却先给了我一篇报摘《发

生在当年的一场辩论》。他写对联原文是：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没想到陈伯达把反动血统论强加给他，又将他投入监狱。

巧遇不仅如此，1970年郭宝昌从南口农场发到张家口沙岭子和我们一起改造了，到2009年，被改造的这一行人一起回到大狱怀旧。我由衷地说：宝昌，你最牛，45年前，学院批斗你宣传地主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那时不过言论而已。现在，你一部《大宅门》反弹，让全国人民都来体验同仁堂的生活方式。牛！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乐了，腰杆直又直。

### 63年后回故里

2013年3月5日，我回到故里广西岑溪古太村，63年前，我从这里逃亡。

古宅是青砖碉楼别墅，四栋拆了两栋。我小时玩耍的回廊依旧，挨着我读书的屋子二楼正厅曾是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办公室，砖墙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标语上挂满了蜘蛛网。

爷爷建立的古太中学，依旧伫立在山岗上，门框的墙口有他书写的楷书：古今书可读，太上德长修，横批是古太学校。黄底黑字，大大的，远在村口就清晰可见。圆拱下有文革遗存，红太阳焊在铁门上，铁条放射代表光芒，上面有八个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小小的，稍不留神就被忽略了。

多年寻亲现在有了结果：生父黄健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五战区司令部少将参谋，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国政府，接收广州。1947年任台北师管区参谋长，在台湾2·28事件中因拒绝向民众开枪，被蒋介石严惩，革职免死。殁于1968年，享年61岁。

爷爷黄桂丹，岑溪县四任县长，下属李宗仁任第三纵队司令，阻击日寇未能进入古太境内。他乐善好施，口碑极佳。广西解放前，曾以一个连的兵力保护李济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过境免遭特务暗杀，功载国民党党史。殁于1961年，享年72岁。看两人过世的年份正是我恶遭原罪的时候，简直让我唏嘘不已！

如今，妈妈陶庭弼，爸爸傅博仁，岳父赵瑞蕪都先后过世，杨苡妈妈依旧健在。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从未觉察到四老有任何的责怪，爸爸几乎逢人便说，一生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收养了我。杨苡妈妈还送我礼物，一个小盒里装着一个雕塑少年，盒盖上写着：小傅，永远做个快乐的少年。

他们充满人性的品格，让我高山仰止。在他们眼中我是孩子，孩子做事即便荒唐，也情有可原。但是，我不能因为情有可原就原谅自己，我为我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而永远愧疚。

这是我撰文的本意。

□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3年3月15日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页：[//www.cnd.org/](http://www.cnd.org/)

---